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二十八期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编者的话：人的观感随着对事物的了解程度不同而变化。小时候听到老师激越地朗诵：啊，中国！你那雄鸡一样的版图……豪迈之情油然而生。多年后，发现国民党政府印的中国地图，比较之下，豪情顿减，觉得新版图怎么看都像被一张大嘴咬过的煎饼，还带着牙印儿呢。又过了几年，看到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应不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文章说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外蒙古独立，还把这一“咬”归结为蒙古人民的“全民公决”。

一九五七年王造时教授落难，罪名是反共反苏，于是人们知道他曾带头写过一封致斯大林元帅的信，反对苏联把外蒙古分裂出去——原来咬这一口的是“老大哥”，后来毛泽东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也就是托派分子越飞说的“一般的帝国主义”。其实，它所传承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它继承的是彼得大帝和凯瑟琳大帝的丰功伟业。它靠铁腕加手腕侵吞了大片别人的领土，成了名副其实的“各民族监狱”。它只是“帝国”，没有“主义”。

近百年来，两国（中、苏或俄）三党（苏共、中共、国民党）五领袖（列、斯、孙、蒋、毛）之间，相生相克，相助相争，时而因“主义”合纵，时而由利益连横，此消彼长，明争暗斗，直至各自的江山变主再变色，成为国际关系史、国际政党史上颇为奇特的景观。这期间，又有美国、日本介入，热战、冷战相接，更造成局面的纷繁及发展道路的曲折。

问题是，这样激荡的历史现象造福于人民了么？带来了文明和进步么？如果说，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推销”自由贸易，试图把中国纳入它们主宰的全球体系是强权行径，但它毕竟也传播了新的思想和先进的科技；而“社会帝国主义”，除了与前者相同的操纵、凌驾、掠夺之外，还带来了多少值得学习、保留的东西？

星移斗转。如今北邻更名，姓俄不姓苏，散了摊的旧日帮主另谋生路，“顺乎世界之潮流”；南边的国民党也凤凰下架，早没了当年吹胡子瞪眼、动不动摸枪的威风，求一张选票也得“合乎人群之需要”。遗憾的是，总有些人对此天地翻覆视而不见，以为无论如何彼此搭过伙计，“和尚不亲帽儿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一厢情愿地去结发展战略迥异的“战略伙伴”。

历史老师不光教书，到时候也收卷。

本期“意林”刊登胡洛卿女士惠赐谢山先生遗作《戏解西游》。谢先生奇人奇文，大智大悟，劫后泪笑分说九九八十一难，个中况味，自不难体会。

历史是个好老师 靳树鹏

—

十来年前读到朱正的《解读一篇宣言》，他解读的是1919年7月25日

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1920年9月27日又有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经过朱先生的解读，我们知道这是虚晃一枪的欺人之谈。

沙皇俄国共侵占了多少中国领土呢？中国政府1969年有个统计：1859年《中俄璦琿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平方公里；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割去七万多平方公里。这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差不多是两个东北三省。朱正先生写道：“从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发表，直至今日，这些被占领土并无尺寸归还。”2005年6月2日中俄两国外长互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批准书。报道称：“这标志着两国彻底解决了所有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俄最后一部分有争议的边界土地，包括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的黑瞎子岛和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州渚在内的近375平方公里，双方将各得约一半”（《环球时报》2005年6月3日）。中俄双方有争议的这两个地方近375平方公里，其中黑瞎子岛约300平方公里，这篇报道说黑瞎子岛是1929年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可知时至今日，朱先生上述说法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为什么受到当时中国各界人士高度赞扬和热烈欢迎的苏维埃政府对华宣言竟然是言不由衷的一纸空文呢？读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就看得比较清楚了。该书编者在绪论中写道：“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实际目标一直互不相容，这是造成苏联外交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的根源之一。”还写道：“布尔什维克的对外（对内）政策，是由一整套空想主义的和矛盾的思想决定的，其中居统治地位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编者还在该书第一部分导论中写道：“为了保证在远东的国家利益，苏俄代表坚持要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即现存北京政府从法律上承认俄罗斯联邦。与此同时，苏俄领导还酝酿了一个计划，打算利用各种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这样或那样的联盟在北京建立另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苏俄又想推动世界革命，又想保住在远东的利益，能不矛盾吗？可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都听命于苏共中央，他们是一家人。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固然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但说这是他们对外政策“居统治地位”的思想也不尽然。他们在中国积极支持组建共产党，同时抓紧与北京政府谈判，与孙中山、吴佩孚、张作霖频繁联络。在发表对华宣言时，他们更多的是为了保证在远东的利益，所以他们不会把大宗的卢布和武器给中共，而是给了向中共举起屠刀的人。

这套丛书是根据解密档案编辑的，第一卷收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时间是1922年8月31日。会议决定发给越飞如下电报：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即两次对华宣言——引者）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至于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

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派克斯同志的指示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在租让企业问题上，中央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俄国的受降权（原注：显然是指放弃所谓庚子赔款中的俄国份额），但需要作出更准确的表达。所有这些让步都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一旦可以在此基础上同中国政府沟通，中央认为在同日本谈判开始之前，起草一个初步的议定书是可行的也是需要的。关于同日本谈判的问题，中央同意您的建议，即从法律角度据理力争，但不搞最后通牒。

中央书记 斯大林

这份电报的意思很明确，指示其驻华代表越飞在同中国谈判时不能以对华宣言为根据。对华宣言说把过去在中东铁路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显然是假的，这份指示电报明确说要保证他们在中东铁路的特权。对华宣言说放弃庚子赔款也是假的，这份电报要求中国以法律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事实上后来的一切也都是按斯大林这些指令办的。越飞收到这份电报后于1922年9月27日给俄共政治局的信中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要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的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

朱正写这篇文章时，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中国内地还没有译本出版，他也从海外报刊查到了前引斯大林签署的电报和越飞的信。他最后写道：“被托洛茨基称为‘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越飞无法赞同这样的政策。他是在1927年自杀身亡的。他在这信中的一些话竟成了很准确的预言，苏俄在对外政策方面同一般的帝国主义不再有什么区别了。后来毛泽东称他们为新沙皇，是很恰当的。他们在1922年不再承认对华宣言的时候，就已经是新沙皇了。可悲的是，那时，甚至那时以后很长时间，中国人还在宣传这宣言，赞美这宣言。”

二

最让人不好理解的是十几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读本还在赞美苏俄对华宣言，对后来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不予闻问。日本曾向新生的苏俄进攻，出兵占据西伯利亚和库页岛北半部，迫使订立《苏日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宣布“苏联承认1905年《朴茨茅斯条约》继续有效”。《朴茨茅斯条约》是整整一百年前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乞和时签下的，其中有：俄国将包括旅顺口、大连湾在内的辽东半岛租借地及其附属的一切公共财物，让与日本；俄国将由宽城子（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一切支线、铁路区域内所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在内，都转归日本等等。苏联政府宣布《朴茨茅斯条约》继续有效，就等于宣布对华宣言已经无效。1937年中苏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苏联就置这个条约于不顾，又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其中有：相互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领土之完整和不可侵犯性。苏联事实上承认了伪满州国。消息传出，举世大哗。救国会的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信，张申府改定，共有九人签名，沙千里抄写成一式两份，分别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对苏联的做法“表示莫大的遗憾”。这是直接向斯大林叫阵，建国后王造时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冯英子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王

造时一信误半生》，就是说的这件事。

最蹊跷的莫过于1935年苏联无视中国主权，单方面将中东铁路以总值一百一十七亿日元低价转售给伪满州国，十年后雅尔塔会谈中，斯大林对罗斯福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诸条件之一就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苏共同经营，罗斯福同意了。你已经把中国的东西私自卖出去了，现在又要和中国共同享有，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逻辑呢？

笔者出生在吉林省敦化县（已改为市）火车站对面的站前街。敦化是个大站，从我记事时起客车都是停车十五分钟，站前一带也是传闻较多消息灵通的地方。一百年前日俄战争时，有许多父老乡亲在俄国大兵刺刀威逼下从事苦役。七十年前日本侵略者的并屯烧杀，长辈至今还常谈起。苏联红军即将进入县城时，父亲让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躲到乡下外家，局势稍稳定才回来。那时我虽然是个八九岁的孩子，许多事至今还记忆犹新。红军士兵骑着高头大马跑过。谁都知道他们的口头禅是“马达母，上高！”（即“女人，好！”）苏军纪律之差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听到。由苏军武装押运的一列列装满物资的火车从眼前进进出出。直到今年读到薛衔天先生的一篇长文《苏联拆运我国东北机器史实》（《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才对整个事件有了真切了解。文章说：“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的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就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美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他说：“中国抗战八年，苏联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也都赞成中国这一正当要求，斯大林本人当时对中国这一要求也表示“同情”。后来的结果是怎样的呢？“苏军不仅将东北现金、证券、金银搜刮一空，而且不分军需、民用，将东北轻重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拆运而去，造成亘古浩劫，这是二战后一起最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事件。”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这篇文章说，斯大林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联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这篇文章还披露，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过程中，“斯大林说，旅顺口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辟为自由港，长春铁路中苏共有共管，外蒙古独立，这些问题不解决，他就无法向苏联人民交待苏联为什么出兵东北。”苏联出兵东北是为了把东北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还是别有所图，斯大林自己的话应该使中国人清醒了。

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日本投降已成定局。戴高乐曾这样评说：“苏联在太平洋战场参战又有什么用呢？原子弹已经准备好了。杜鲁门和丘吉尔到波茨坦的时候已经知道内华达州的试验成功了。几天以后日本就要遭到可怕的轰炸，并因而投降。现在要俄国人参战，从军事结局的观点来看，不起任何作用。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却使克里姆林宫取得了以胜利者的名义插手远东事务的权利。因此，无论在亚洲方面，还是在欧洲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波茨坦会议不会达成任何持久的谅解，相反，它只会引起苏联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无休止的磨擦。”（戴高乐著《战争回忆录》第三卷）

1945年8月6日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投到日本广岛，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同一天第二颗原子弹又投到长崎。苏军很快占领东北全境，摘了一个大桃子。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为尽快消灭日本剩余的军事力量起了很大作用，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东北根据地。

三

几年以后，蒋介石败走台湾，斯大林同中国打交道的对手已经是毛泽东。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建议中国出兵朝鲜，毛泽东同意了。

《读书文摘》2005年第4期（上半月）头题是师哲的文章《朝鲜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1950年10月4日，中央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该文说中央主要考虑到：“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与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已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害怕战争）。”政治局会议多数人的意见是不出兵朝鲜。10月8日，周恩来就是带着中共中央的这个意见从北京出发秘密访问苏联。飞抵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和正在莫斯科养病的林彪去南俄斯大林的休养所，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其他委员都等在那里。周恩来开门见山就说中国以不出兵为宜，并极具说服力地阐明不出兵的理由。斯大林不想同美国直接交战，却鼓动中国同美国直接交战。

第二天周恩来一行飞回莫斯科，就收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报。师哲看到电报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主张出兵。师哲大吃一惊，马上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根本不信，认为师哲看错了。这怎能让周恩来相信呢？几小时前他同斯大林谈的都是不出兵，现在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师哲说：“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可知这是政治局迁就毛泽东一个人意见的结果。

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鼓动毛泽东出兵朝鲜，不仅仅如表面所说是援助北朝鲜，还另有原因。1950年1月5日杜鲁门的谈话已清楚表明，美国不打算保卫残存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也开回夏威夷，甚至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准备援助四十亿美元帮助中国恢复建设。朝鲜战争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朝鲜战争）无论是事出偶然还是谋划在先，结果终归是对莫斯科有利。苏联的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论文谈道：‘朝鲜战争……在长时间内阻止了民族主义的中共领导人和美国统治集团的勾结，迫使中国领导者进一步与苏联合作。’”这是说朝鲜战争阻挠了中国和美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中国一边倒倒向苏联，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还有一个问题是，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在莫斯科谈判的结果之一，是苏方同意1952年底把中国长春铁路无偿移交中国，从旅顺港撤走苏联军队并把该地设施移交中国。到了1952年年底，铁路移交议定书在哈尔滨签署，随之举行了正式移交仪式。由于朝鲜战争等原因，远东局势紧张，苏联军队仍留驻旅顺口，这是苏联海军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

闲居无事，断断续续读了几篇有关历史旧帐的文章和史料，想起了葛兰特图书馆的一条标语：“历史是个好老师，如果你一次没学会，它会不断地重复。”

作者简介：靳树鹏，吉林省建设厅退休人员。1937年生，1961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多年从事陈独秀、顾准、中国托派等专题研究，主要著述有《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和长期封建社会》、《为经验主义正名》、《陋室漫笔》（文集）等，主持编注《陈独秀诗集》，主编《村镇规划与建筑》。

意林

戏解西游 谢山

俗语：跳不出如来掌心。似乎如来法力无边。但细思之，这法力其实亦有限，三千年一劫，即是历史发展规律。五行山也有崩颓之一日，岂能违反沧海桑田的规律。孙大圣被压了几百年，到头来还得放他出来，再关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如来也不得不出此一招，只是加了个条件：“皈依佛门”，其实丝毫没有改造好，只是用个金箍骗了他才迫使就范。然而查查记录，几次使用紧箍咒，错的是唐僧，由此可见紧箍咒的教育意义的渺小以至无能了。孙大圣放了出来，脾气还是依旧，看来还是挺“顽固”的，他是石猴，脑袋自然是花岗石的。

皈依佛门后成了正果有何意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孙猴子被封了一个什么佛，可是人们并不以此相称，人们只称他为“齐天大圣”，沿用他自己的称号，惦记着他大闹天宫，从不记得他叫什么什么佛。上天的封号还不如他自取的花名，真怪！这似乎是对神佛的亵渎。阿弥陀佛，罪过。

一般人认为《西游记》是神怪小说，我认为如透过神怪的外衣，把它作为一部社会小说来看意义更大，而且可发现不少新的启示。例如：取经路上遇到一些妖魔，总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土妖精，法力小，为害也不大，结果却被孙悟空一棒打死，名之曰为民除害——这是妖精的应得下场，体验“天法”的严正；另一类是有来头的，而且后台很硬。这些妖精都法力高强，几乎置唐僧师徒于死地，连几次请来天兵天将也无可奈何，最后发现他们原来是神佛的徒儿、坐骑、宠物，以及下凡的星宿等等。案子结束了，没有听说要受什么严厉处分（当然更没有刑事处分），而且他们的主子们也没有因为管教不严造成后果严重而被天庭撤职查办，似乎连检查也没有写呢！而唐僧师徒所受的折磨只当是活该，名之曰考验，而且还须不断经受考验，直至历尽八十一难。我想这是小说家为了写完这部名著，才让唐僧师徒活下去的，换个凡夫俗子，肯定受不了这般多的磨难，想想那些对手的后台多么强大！妖精中还有一类虽然没有来历，但是本领太高强了，于是，被神佛看中，收了去做镇山大使等等（如黑风怪、大鹏怪以及红孩儿等），当然皈依成佛后，也是前罪一笔勾销，还可享受人间香火供奉！这是第一类妖精所不能梦求的，原因就在于这符合一条辉煌的原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原来所持的屠刀，确是够锋利的，而第一类妖精缺乏的就是这把锋利的屠刀，尽管罪恶小，却不能援引成佛的原则而只落得严厉镇压的下场。所以第三类其实可以和第二类合并为一类。从来妖精只能分为两类：一是和神佛无直接关系的，即土生的，严惩不贷。一是和神佛有关的（已有组织关系的，或可以发展的），治病救人，全力挽救。

上述发现也许比《狂人日记》的从字缝中发现“吃人”两字更有意义。不过这一发现，却使取经这一伟大事业的神圣光圈黯然褪色了。佛祖真是为了普济众生而把真经传来东土吗？为什么阻碍取经的恰恰是那批与神佛有关联的化了装

的“魔头”呢？自圆其说的所谓“考验”，只能使身受其害者感到啼笑皆非，痛心疾首。究竟在普济众生的幌子下干出了了一些什么勾当？从对待妖魔的态度上看，难道还分不出谁亲、谁疏？

我又发现《西游记》结局还漏写了一大段。书中说到取经以后，唐僧师徒都成正果，授予佛号，其实不然。当时诸佛对孙悟空做鉴定时，认为他首先出身不纯，不如唐僧是佛门弟子，八戒是天蓬元帅，沙僧是卷帘大将，出身高贵，连白马也是龙宫三太子，而孙只是石猴，缺乏“神性”，此点是原则问题，非常重要，不能越级擢升，更不能上升为佛。说到取经路上的表现，更是意见一大箩，如一，屡次和师父顶撞，不尊重领导。二，遇事擅作主张，违反上级意图。三，逞强好胜，突出自己，目无组织。四，凶狠好杀，全无佛门慈悲胸怀，缺乏“佛性”。五，阳奉阴违，屡教不改，无纪律性。六，作弄八戒，群众关系极差。此外还提了几十条，每条都有确凿的事例为证。特别是，原在天国有组织关系的妖精在人间胡作非为，被猴头揭发控告，使诸佛大伤脑筋，认为给天国抹黑，怒不可遏（但这一点，他们自然不便明说了）。据说弥勒佛为了缓和气氛，提了一句：“悟空虽然缺点不少，但取经路上立功不小”。此话当场受到反驳，主要论据是：取经的成功，是由于我佛光辉照耀下，各方神佛的多方护持下，六丁六甲天兵天将的密切配合下，唐僧的具体领导下，八戒、沙僧、白马的全体努力下，还有尘间大批善男信女出于对我佛虔诚顶戴而作的积极支援下才能获得辉煌胜利，关猴头屁事！少了一头猴头，难道地球就不转了？真经到不了东土吗？猴头生性泼赖，专事捣乱，以前触犯天纪，我佛以慈悲为怀，容其改过自新，将功赎罪，取经是他争取改判减刑的机会，根本谈不上“立功”。据说有的佛还振臂高呼：“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口号。最后还是如来作了结论：“从宽发落，既往不咎，孙悟空要接受意见，吸取教训，不可泄气”。当然这次评佛是评不上了，不过金箍圈准予取消了——其实，那个金箍圈当时锻造就很粗糙，已日久朽烂，不除它，也起不了当年的作用了。事后听说孙悟空被激得金睛火眼几乎爆裂：“猴子就猴子，老孙从来就不想成佛，宁可压在五行山下还自在些，好过受这么多窝囊气，老孙也不受骗去取什么真经了”，把观世音大骂了一顿，说她是头号骗子，以后一个筋斗跳到不知哪里去了……所以他也没有成佛。这才是《西游记》的真正结局。

吴承恩不能写得太长，感到太累了，于是草草收场，偏漏了这重要的一段。我希望有人用现代语言，补写一部西游故事新编（例如，孙大圣在地府“勾销生死簿”，翻译成现代语言是“销毁黑名单”）。

1986年11月30日